

编者按:

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2015年第十二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4月24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据介绍,一年一度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是国内保险与社会保障领域的重要学术活动,通过搭建政产学研交流沟通平台、推进理论研究与知识创新,为中国保险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出贡献。本届论坛上,记者采访整理了各位嘉宾的发言,以飨读者。

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

——2015年第十二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嘉宾发言摘要



王祖继



刘世锦



桂先农



孙祁祥



赵宇龙



陆勤



彭吉海



郑伟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王祖继： 现代保险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开放的命题。应该说,保险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制度供给。

首先,保险精神符合现代国家治理核心价值观。现代保险机制源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共济理念,充分体现着人类社会对文明进步和自我管理的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全体社会成员、每个社会个体的扶助和关怀是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现代保险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大大丰富社会保障体系的层次,大大提高社会保障的运行效率。从这个角度讲,保险业的繁荣,彰显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其次,保险功能符合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势。“新国十条”提出,现代保险业要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机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中,保险机制的独特价值在于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经济化,支持政府在市场、社会等自我管理领域逐步退出,通过市场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统筹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力量的一种系统治理的制度安排。巨灾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等领域都是现代保险机制发展的成功实践。国际上专家学者将治理理论应用到保险领域,初步提出了保险社会的概念。这就将保险学的研究从经济学领域拓展至社会学领域,为保险与国家治理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保险机制符合风险社会的稳定性需求。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特征,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人类社会风险因素更加多元化,风险形式更加复杂,社会风险、巨灾风险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经济社会对保险的需求显著增加。对于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政府和社会而言,面临的挑战尤其巨大。当前,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经济增速在一定阶段都会出现一个下滑,应对下行压力关键是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解决长期粗放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面对新的风险需求,现代保险业呈现出开放的发展理念,借助新技术手段和金融创新机制将越来越多的不可保风险纳入保险管理范畴,并且积极寻求与政府、社会合作,在保险机制的框架下动员全社会力量应对风险。可以预见,在当今人类社会加速进入大数据时代的进程中,保险业对于风险管理的能力将再次提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经济发展最终要靠实体经济

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学习领会“新常态”,其第一个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大家都在关心,什么时候经济才能下行?我本人的判断是,不下行大体需要三个条件:

一是高投资。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高投资,基础设施占20%-25%,房地产占

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占中国投资的80%-85%。

二是基础设施增多,高峰期在2000年左右。三是房地产。房地产从去年开始调整,有人认为是周期性的,但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因为中国房地产70%以上是城镇住宅,其需求峰值大概是1300万到1400万套住房,这个峰值去年就已经达到。目前基本上走平且向下走。

当高投资速度放缓后,供给端的重工业等也要相应地减缓速度,但这个调整很慢,于是出现了所谓严重产能过剩。但中国这种情况,和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通缩是大不相同的,虽然称为通缩,但它的主因并不是流动性不足,而是过去十几年高速增长期形成的过量过剩产能,且没有得到及时调整。

大家很在意GDP下降,我觉得这还是个表象,最重要的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从去年8月份到今年一季度,企业盈利水平一直在下滑。如果大部分行业都能够有比较稳定的可持续的盈利能力或盈利状态,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其实是次要问题。

现在政府很关心,实体经济怎样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特别是资金价格怎么能够降下来?实际上现在资金成本是很高的。央行降准一个点,释放了上万亿流动性,实体经济的资金价格就降低了吗?资金真的流向实体经济了吗?

不论金融领域还是其他,经济发展最后还是要靠实体经济发展,金融说到底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国怎样限定泡沫性的投机性的资金?怎样创造一个真正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有利条件?这其实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再平衡。

台湾保险事业发展中心顾问桂先农： 台湾拥有大陆需要的较成熟保险技术

台湾经济发展大致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朝时期。第二个是日本占据台湾的时期。第三个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到1960年,台湾经济进入到农业复兴及农业工业发展时期,也是台湾保险业的起飞时期。第四个是1960年到1986年,台湾经济转型,成长非常快速,台湾保险业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第五个是1987年至今,台湾经济已进入高科技和服务业导向的经济,台湾保险业也进入了高度竞争的时期。目前台湾共有28家产险公司、27家寿险公司和3家再保险公司。

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率维持到4%就很令人满意了。但是民众平均所得在增加,到2013年,台湾民众平均所得是2万美元。财富增多,民众对于保险的观念就能接受,外商保险来到台湾以后,比较强调保障型产品,健康险也被重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越来越重视保险业的理财功能。

财产险在台湾因为台商外移而大幅度减少,农业保险在台湾都是政府补贴。走到新常态,保险业也开始趋缓,市场已经饱和。财险保费收入从2002年到现在都是1000多亿台币,去年还不错,保费收入达到1322亿台币,因为新车增长了40

万辆。人身险保费收入不错,从2006年首次突破2兆台币,去年是2.7兆台币。

台湾有个政策性的住宅地震基本保险,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开始推动,到去年年底投保率31.5%。台湾还在1986年推动社会保险,包括全民健康保险、公教人员保险等。

目前保险业在全球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年代?一是长期低利率,二是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三是国际组织、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四是人口极度老化,五是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气候变迁造成天灾,发生的频率非常频繁,过去50年、100年才发生的,现在一两年就发生。台湾拥有大陆保险业所需要的比较成熟的保险技术,一定要紧密合作,提升两岸华人保险业在世界同行中的地位。

北大经济学院院长、CCISSR主任孙祁祥： 现代服务业课题值得认真探讨

今年北大赛瑟论坛的主题是“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任务,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提升综合国力有效途径,也是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内在要求。

在过去几年间,我国服务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44.2%提高到48.2%,成为三大产业中比重最高的产业,今年第一季度甚至首次超过50%。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服务业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尚未形成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支撑,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国际竞争力不强,服务业人才不足,标准化水平较低,制约发展一些长期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解决。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之一是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中央提出稳增长调结构,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什么是现代服务业,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如何看待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探讨和研究。理论是实践的向导,理论的探索、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争鸣,对于改革实践非常重要。北大赛瑟论坛一直秉持这样的理念,通过设立一个思想交锋和争鸣的平台,探讨中国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由此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今年是北大赛瑟论坛第十二届年会,12年来我们得到北京大学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深感荣幸。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中心才能够始终秉持成立之初所设立的宗旨,充分发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风险管理及保险学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优势,借助中外保险与社会保障领域的重要资源,加强学界、监管部门和业界的密切合作,促进保险与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知识传播与实际应用;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中心才能够始终朝着它成立之初时定下的目标前行,为中国

保险与社会保障领域的思想交流、信息共享、人才培养、国际合作提供平台,建立政产学研相结合的基地;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中心才能够连续三届蝉联北京大学优秀科研中心的称号。

今年我们收到论坛征文110多篇,经过匿名评审,最终挑选出40篇在今天上午进行专题研讨,在今天下午的大会上,我们还将向其中的两篇优秀论文颁奖。

保监会财务会计部副主任赵宇龙： 新常态下“偿二代”监管规则的三个新定位

关于新常态下到底怎样进行金融监管,我们称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对新常态的理解,习总书记有一系列阐述,从速度来说,高速增长到中高速;从经济发展动力来说,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经济结构方面,不断升级,这是新常态最基本的三大特征。

在过去3年里,保监会做了一项很大的创新,就是风险导向的偿付体系,简称“偿二代”。

“偿二代”作为新的监管规则,有三个新定位:第一,新的监管规则要从行为监管到风险监管,从金融的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第二,要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独立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切实防范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金融风险;第三,要从国际规则的跟随者、遵守者向参与者、推动者转变。

如何做?首先,保险业的增长过去主要是靠规模导向,靠大量的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去获得保费和市场规模的扩张。但是下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新的监管规则的建立,促进整个行业从过去的要素推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监管要放开前端,管住后端,这就是风险监管。金融创新,千变万化;金融监管,不离其宗。

其次,金融监管的规则,要从过去所说的旧金融、旧保险的视角转变,要将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放在一起来看。在新常态下,我们通过“偿二代”新的体系,来推动整个保险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作为全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和第三大保险市场,利益诉求想要得到体现,就要有自己的东西,所以必须要做一个创新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体系去对话,去互动,这是我们要做的课题。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保险机构走出去后,在海外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在行业“走出去”的同时,我们金融监管规则的对话也要走出去。

瑞士再保险公司中国区总裁陆勤： 国内主体应抓住再保商机

“偿二代”将原来以规模为导向的监管转化为风险为导向。转化以后有一个风险:在市场里的主体因为存在风险分散的问题,他们都购买再保险,而在购买再保险进行风险分散的时候,很多国内主体是跟海外的再保险公司进行交易,那么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我的东西在你手里,其实是管不到你的”。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说海外再保险公司关门了、倒闭了,那发生巨灾的时候,国内的保险公司就有可能面临风险,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国内的保险公司和投保人。这个风险因子在整个框架中占有很大的一块,“偿二代”也第一次对此做了比较突出

的关注。

“偿二代”刚推出的时候,市场上也有很多不同声音。市场从一开始觉得风险太高,逐渐转化为认识到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如果说把这个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规范化,那自然而然会促使那些海外再保险公司主动考虑到国内来设立机构,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对于国内主体而言,再保险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商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目前来讲,中国国内市场只有8家再保险主体,作为这么大的市场体量来讲,数量是很少的。

至于更多的主体进入市场以后,瑞再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业务造成一定冲击?首先,我们并不担心。瑞再150年了,经历过风风雨雨,其实竞争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事,竞争并不可怕。

其次,关于在国内投资建立再保险主体方面,我建议从几个角度考虑。全球的再保险公司,据不完全统计有200多家,数量并不少。但是,如果看一下前十名的再保险公司占整个全球再保险市场份额,在高的年度会达到90%,低一些也会在80%,剩下的190多家再保险公司只能占10%-20%,这里面能看出一个很大的差别。保险公司在选择再保险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需求。因为再保险不是完全“有他没他”这样一个排他性的竞争关系,一家再保险公司牵头,做首席承保人,把这个合同谈下来之后,这家公司可能作为首席承保人拿30%或20%,剩下的70%、80%转到市场上,由其他再保人去认购。再保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钱很容易拿出来投,但是投出去以后如何运营、如何回报,却没有那么简单。

阳光保险集团副总裁兼CFO彭吉海： 发挥保险投融资增资作用提供创业保障

我国虚拟经济发展很快,而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在逐步放缓。企业如何通过虚拟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从企业角度来看,我觉得保险可以发挥投融资增资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资本市场的作用。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增加创业机会和满足创业的资本需求,保险行业作为金融产业的支柱之一,应当发挥好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经过保监会的批准,今年年初我们成立了一家私募投资基金,这意味着保险资本可以向实体经济流动。

二是支持民间融资,包括提供企业间投融资服务,发挥保险的融资征信作用。

三是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比如国外的创业保障保险,创业或开展创新型业务时,如果有保险保障,就可以发挥保险在鼓励和激励创业方面的作用。这在欧美国家很常见,特别在硅谷,有很多保险企业在做。

阳光渝融信用保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刚获得保监会批准,这是国内首家获批的专业信保公司。作为第一家开展和支持这种新兴业务的专业化管理公司,我们同时选择了一种创新的商业运营模式,即通过互联网经营业务。现在大家都知道P2P业务,包括信托、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债权债务计划等。但实际上,去年有很多“跑路”公司支撑不了这种平台,因为他们的融资成本

很高。据我了解,P2P的融资成本大约是15%以上,个别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在30%以上。融资成本之所以高,是因为企业没有抵押物。

我们的业务可通过第三方对其进行综合信用的评估,使融资过程更简单。我们规划中的最大核心点是不做零售客户,不去找融资方和资产方,而是更多借助汇集双方数据的风险信息管理平台,找到客户评级数据。这个信息管理平台一方面是和人行征信系统相对接,另一方面,数据交换可以充实我们的数据库,便于我们向融资双方反馈更多的数据积累。

虽然阳光渝融的注册地在重庆,但属于双总部的概念,管理总部在北京,大部分作业体系在重庆。

北大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 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监管制度需配套

今天的主题是“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如果从保险的角度,现代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接下来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保险业如何深化改革,夯实发展基础。在我看来,市场化可能是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而且渗透到了方方面面。

关于市场化,在几年前并不是没有这样的考虑。一方面确实有一点瞻前顾后的感觉,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最后都归结到后端。比如费率市场化,为什么十多年前我们的商业车险市场化改革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在五六年前的我们的人身费率市场化推不下去?如果后端管不住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实施“偿二代”有人问,7000万的线是怎么定的?我只能告诉他借鉴了欧洲的标准,用一个汇率换算出来的,没办法。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有自己的能力来构建中国的特色,市场化可能是下一步必须要做的,同时和这个市场化相配套的,一定要有相关的专业监管制度。

谈到商业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关系以及政府定位,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结论。在很多社会保障的事务当中,PPP现在可以说是国际的共识,一定要公私合作,完全靠政府不行,完全靠市场也不行。具体在某个国家PPP是什么模式,这也因不同国家、国情不同,社会制度、文化等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在中国养老,到底怎么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来探讨。因为在以前我们觉得养老要靠政府,后来有一段时间经历了市场经济大潮,觉得自己养自己,但是在过去这5到10年,随着养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人又开始回到开始那个时代,又觉得养老应该靠政府。

通过国家还是商业来提供,从一个中立的研究者角度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问题。问题是,即使做了空头支票,通过简单的测算就能知道是不可持续的。到2048年,目前的城镇职工养老制度完全收不抵支,这个体系就破产了,这是一个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不是说不需要市场,我觉得作为国际共识——市场和政府怎样共同携手应对,这才是中国贯穿整个21世纪的巨大风险和面临的挑战。